

重構創傷經驗的書寫療癒： 台灣女詩人江文瑜〈木瓜〉詩之 慰安婦形象再現

李癸雲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中文摘要

江文瑜的〈木瓜〉一詩是台灣現代詩裡罕見以詩為慰安婦阿嬤代言的文學作品。本文論證江文瑜以詩再現「慰安婦」創傷，一方面能將創傷賦義轉化，讓慰安婦故事進入社會認納的層次，減輕恐怖真實的侵擾，重構創傷主體與世界的連結。同時，文學成為一種記憶歷史創傷的公共論述，對於主流的歷史敘述而言，多元而異質的慰安婦創傷故事加入，更可產生質疑大歷史因民族、權力或性別問題而「消費」慰安婦的存在，或為了便利性或曖昧性而剝除慰安婦的歷史位置。此外，江文瑜的再現是從被殖民者女性的立場書寫她們的個人生命史，也從女性角度重新看宏大的歷史事件，同時具備庶民史、女性、被殖民者的觀點，其書寫成效在於「建構女性的史觀」。

關鍵詞：江文瑜、慰安婦、創傷經驗、書寫療癒

**Healings through Reconstructions
of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 Poetry: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mfort Women
in “Papaya,” a Poem of Chiang Wen-yu,
Taiwanese Female Poet**

Lee, Kuei-yu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Chiang Wen-yu’s “Papaya” is a rare modern poem which expresses comfort women’s affections in Taiwan. This paper explicates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mfort women’s trauma through poetry is able to transform the significance of trauma into signifiers and then make these women’s stories be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as well as decrease the harassment of horrific reality. Hen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ffering subject and the world is reconstructed. In fact, literature is a public discourse of historic traumas. The diverse stories of comfort women can query that if the mainstream history deprives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se women because of nations, powers, or genders. Moreover, Chiang Wen-yu wrote their life histor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lonized females. In other words, Chiang inspected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plebeians, females, as well as the colonized, and thus the effect of her work is “constructing the female historical viewpoint.”

Key words: Chiang Wen-Yu, comfort women, traumatic experiences, writing healing

重構創傷經驗的書寫療癒： 台灣女詩人江文瑜〈木瓜〉詩之 慰安婦形象再現

一、導論

「慰安婦」(comfort women)一詞是指 1937-1945 年間的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為了避免各地頻繁發生強姦事件、緩和士兵的殺戮衝動、預防士兵感染性病而折損軍力、鼓舞皇軍的作戰士氣等原因，在戰場或統治區設立「慰安所」，其中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婦女¹。在這個制度之下，東亞有數十萬婦女被日軍以強擄、誘騙或徵召等方式納為慰安婦²。

慰安婦返國之後，除了要面對身體之傷，更遭受外界有色眼光的二度傷害、自我卑賤的主體價值感否定。可以說，慰安婦的創傷是性別階級差異裡最邊緣、弱勢、極端的例證，因為包括女體遭受的性暴力傷害、戰爭中國家機器合理化男性對女體的剝削、傳統父權思想歧視的眼光等。然而對於慰安婦問題的公共關懷則是戰爭結束後多年才展開，南韓起於八〇年代末，台灣則始於九〇年代初。為何如此重大的國際性別議題，會被噤聲或擠壓至歷史主流論述之外？又為何在八、九〇年代間，各國政府或民間團體開始針對慰安婦問題向日本政府

¹ 朱德蘭，《臺灣慰安婦》(台北：五南，2009年)，頁31。

² 朝鮮中央通訊社的網站資料統計朝鮮慰安婦有十四餘萬人。(http://www.awf.or.jp/e1/facts-07.html, 2017/10/10 查詢)。中國學者則主張中國婦女淪為慰安婦的至少有二十萬人，而台灣婦女救援基金統計台灣慰安婦至少在 1200 人以上，除此還有日本、海南島、東南亞國家等地也都有婦女成為慰安婦的紀錄。

進行譴責與訴訟、索賠？其中連動了哪些國族論述、政治主張、社會議題、性別意識型態等層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彭仁郁曾撰二文〈進入公共空間的私密創傷：台灣「慰安婦」的見證敘事作為療癒場景〉、〈過不去的過去：「慰安婦」的戰爭創傷〉，強而有力的論證慰安婦議題的曖昧性。其中，她指出幾點成因，慰安婦問題因被滲入商品交易邏輯而削弱了奴役實質；是國際罕見的由日本國家機器直接涉入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非法行為；日本軍人往往以性暴力作為報復敵軍、奪回掌控感的發洩管道；性別成為國族政治意識型態的附屬品；前此官方的刻意忽略，緣於「性」與「服務敵軍」的不純粹；慰安婦存在有著曖昧性，因輔助敵軍（殖民政權）而無法收編進大論述等³。

除了彭仁郁的討論，台灣學界目前對慰安婦的研究則多為歷史紀實報導⁴、田野調查的採訪實錄、慰安婦故事的敘事⁵等。其中特殊的是，1995 年以來，台灣「婦女救援基金會」⁶為慰安婦阿嬤們籌辦了「團體治療工作坊」，後正名為「阿嬤身心照顧工作坊」⁷，以不同心理療癒形式（如說故事、繪畫、戲劇等）來處理她們的創傷情緒，並提供支持的力量。

然而，隨著慰安婦問題因人權與女權興起而被國際關注，原本屬於慰安婦個體的身心創傷也必須被「分享」與「公開」。彭仁郁提醒：「讓『慰安婦』的歷史真實，在長達半世紀僅出現在零星的文學作品或報導後正式進入公共領

³ 彭仁郁，〈進入公共空間的私密創傷：台灣「慰安婦」的見證敘事作為療癒場景〉，《文化研究》第 14 期（2012 年 6 月），頁 135-192；彭仁郁，〈過不去的過去：「慰安婦」的戰爭創傷〉，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2014 年），頁 435-513。

⁴ 如朱德蘭，《臺灣慰安婦》（台北：五南，2009 年）、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台灣慰安婦報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等。

⁵ 這類著作，如婦女救援基金會出版《阿嬤的臉：台灣慰安婦倖存者影像紀錄》，婦女救援基金會授權天下文化出版《鐵盒裡的青春：台籍慰安婦的故事》，婦女救援基金會授權商周出版出版《沉默的傷痕：日軍慰安婦歷史影像書》，婦女救援基金會授權張老師文化出版《阿嬤的故事袋：老年、創傷、身心療癒》，婦女救援基金會出版台灣慰安婦筆記書《愛無境》等。另有《阿嬤的秘密》（1998）、《蘆葦之歌》（2015）兩部講述台籍慰安婦生命故事的紀錄片。

⁶ 據其網站介紹，該會於 1987 年 8 月成立，1988 年 9 月正式登記註冊為「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以辦理不幸婦女之救援，提供法律諮詢及服務，輔導其生活與教育，重建其自信自立之人格，助其重返家庭及社會為目的。後來，婦援會成為台灣慰安婦向日本求償的重要民間力量。

⁷ 因為當時受害的慰安婦至今年歲已高，國際支援慰安婦倡議運動組織的成員，一律按照慰安婦國籍的語言來稱呼她們，如 할머니 (HalMeoNi)、阿婆、阿嬤、grandma 等。

域，也相當程度地固定了『慰安婦』故事的敘說版本和形式。」⁸故事版本被固定化的可能，讓彭仁郁欲進一步發問：

創傷敘事作為一種暫時固定創傷記憶的版本，應以何種形式傳承、銘印？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敘說個人史與集體史糾結的人為暴力創傷，才不致剝奪主體揭露自身真相的權力位置，同時允許集體身分認同據以奠基的集體記憶維持其內部的動態異質性？⁹

這些層面的考量正點醒了筆者對文學領域如何呈現慰安婦創傷經驗的研究興趣。文學作品作為集體記憶傳承的形式之一，「該如何」或「已如何」表達慰安婦的故事版本？能否說出創傷經驗的真實，又不致僵化敘述，保留不同創傷主體的異質性？在創傷敘事的背後，文學是否也隱含創作者的敘述策略或政治傾向？而慰安婦議題不僅是個人的，也是國家的，具歷史群體性質，創作者藉此表達出什麼樣的歷史觀點？最後也最重要的，在處理歷史創傷時，書寫的意義究竟何在？

承前之言，以慰安婦為題材的現代文學作品非常稀少，目前只見香港作家李碧華的小說《煙花三月》¹⁰、中國作家丁玲的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¹¹，在台灣則多是紀錄影像或故事採集，罕見以「創作」的方式來回應的，唯有詩人陳千武曾以短篇小說〈獵女犯〉來指陳日本兵執行「獵女」（捉慰安婦）的行徑，著重獵女者與被獵者的心境。而筆者發現台灣女詩人江文瑜《阿媽的料理》詩集裡的一首長詩〈木瓜〉正是慰安婦創傷經驗的再現，並且以詩歌的形式來代

⁸ 彭仁郁，〈過不去的過去：「慰安婦」的戰爭創傷〉，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全體經驗》（台北：聯經，2014年），頁489。

⁹ 同註8，頁440。

¹⁰ 李碧華，《煙花三月》（台北：臉譜出版，2001年）。內容敘述中國慰安婦袁竹林的故事。袁竹林十八歲時被迫當了慰安婦，之後她的人生錯亂一片。戰爭結束後，她仍無法擺脫悲慘的生活，心中始終有個願望，希望日本政府能向慰安婦說聲道歉。

¹¹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桂林：遠方，1944年）。內容敘述內容講述一位中國少女貞貞在遭受日寇凌辱後，又忍受著靈與肉的雙重折磨而做著地下抗日工作，卻又為傳統所不容的故事。貞貞被日本兵擄去一年多後突然歸來，並且得了性病，招致村民的唾棄。然而其實貞貞是派往敵營的密探，以犧牲肉體的方式來獲取敵人的情報。雖然最後「真相大白」，大家對貞貞的高尚行為與犧牲精神深感敬佩。然而，貞貞在經歷了村民種種閒言閒語後已是身心俱疲，最終決定離開霞村去延安治病，以便「重新做一個人」。

言創傷主體的身心狀態，實為難得而少見，因此希望能此詩為研究焦點，深入探討以上的問題。而長期投入女權運動與女性書寫的江文瑜，曾經以書寫力抗父權體制，也曾經擔任「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簡稱女權會）」理事長，積極推動女性歷史的記錄。這些背景在她書寫〈木瓜〉詩是否延伸、輻射成更廣闊的性別議題？本文研究焦點雖然只是一首詩歌，將加入作者相關書寫問題一併探討。

本文的研究方法則以精神分析學說裡的「創傷」理論，作為觀察慰安婦心理狀態與書寫療癒作用的依據。精神分析學界自九〇年代以降才逐漸重視戰爭等極限暴力創傷的研究，而當代精神分析學則進一步將創傷、哀悼、記憶與療癒等議題，放入社會歷史脈絡裡，展開更深層的理解與解析。因此，在探討詩作之前，下一節將先整理「創傷」學理與書寫在其中的意義。

二、創傷與書寫

所謂「創傷」(trauma)¹²，在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學說裡，將之視為：

一種經驗如果在很短的時間內，使心靈遭受非常高度的刺激，以致無論用接納吸收的方式或調整改變的方式，都不能以常態的方法來適應，結果最後又使心靈的有效能力之分配，遭受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之為創傷的經驗。¹³

依此說法，心靈裡的固著情感即是一種創傷經驗的展現。佛洛伊德進一步提出心理創傷形構過程的兩大特徵即是症狀生成的「延宕性」(或事後性)，以及對於創傷經驗的理解與表達中，「詞」(詞語表徵)與「物」(情感表徵)之間的斷裂與錯結。除此，佛洛伊德主張一個被壓抑與不斷重返的創傷記憶會產生持續

¹² 「創傷」一詞源自希臘文，本指身體的傷口，後來在醫學及精神病理學的文獻上，特別是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中，才被引用特指心靈的創傷。

¹³ 佛洛伊德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導論》(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年)，頁264。

性：「迫使未來世代必須超越防衛－壓抑與潛伏，並不得不面對被壓抑之重返：這是除了『敘事性的戀物再現』、紀念活動等之外，還需要其東西來減輕的陰魂不散夢魘。」¹⁴

在佛洛依德之後，凱西·卡如絲（Cathy Caruth）承續並拓深集體性創傷的思維，她說「歷史就像創傷」、「歷史所反映的正是我們每一個個體與另一個個體的創傷交織」¹⁵。在歷史敘述裡可以見到個體創傷彼此交織，個人創傷經驗會轉換成集體傷痛的敘述，歷史敘述也建構於創傷記憶之上。「卡如絲堅持『唯有當見證或再現無法達成，語言才取而代之』，並尋求『一種回應創傷的模式，確保構成歷史內在創傷的意義斷裂或間隙得以傳達』。」¹⁶這些精神分析角度的創傷觀點，近年來在文學或藝術研究裡，近年來發展成為前沿議題，蔚為風潮。例如《英美文學評論》第二十期推出「創傷與文學書寫」專號，推出四篇英文學、歷史災難、日常生活與全球流動等領域的創傷故事研究，主編黃心雅肯定此研究方向，因為：

書寫創傷即在重新造訪深藏的記憶，透過創傷記憶的不斷展演，釋放過去，賦予沉默的過去一個聲音，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書寫創傷是在成就文學與歷史的見證，重塑過去斷裂、雲落、破碎的歷史記憶，成為整個西方國家（族裔）歷史與知識傳承的重要情節。¹⁷

又如陳香君的專著《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試圖說明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的記憶形成過程中，如何一再重複創傷結構的循環（創傷－防衛－潛伏－精神症狀－受壓抑的局部復返），作者建議如二二八事件等具創傷性質的歷史記憶，應透過見證和聆聽，來改變創傷循環。

在當代華文文學研究的範疇裡，也陸續展開研究路徑，例如楊小濱的專著《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討論中國先鋒小說所隱含的歷

¹⁴ 陳香君著，周靈芝、項幼榕譯，〈第五章 二二八歷史與政治創傷的理論化〉，《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4年），頁203

¹⁵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1996), p.4.

¹⁶ 同註14，頁212。

¹⁷ 黃心雅，〈創傷與文學書寫〉，《英美文學評論》第20期（2012年6月），前言頁6。

史創傷訴說，他認為「佛洛伊德的理論並不局限於對個人生活或純粹的性的研究，而是可以被應用於更為廣泛的領域用來詮釋當代中國的文化歷史狀況」¹⁸，由此，他提出「文革」是一種心理侵襲，並成為每個先鋒作家致力追蹤的精神創傷。另外，單篇論著則如王德威〈「頭」的故事——歷史·身體·創傷敘事〉、陳建忠〈歷史創傷、精神危機、自我救贖／放逐：論朱天心與王安憶的都市書寫〉、張小虹〈女兒的憂鬱——朱天心「漫遊者」中的創傷與斷離空間〉等著作，大都從歷史的創傷來檢視作品裡的回應，並試圖作出反應與反動。學位論文方面也有多本研究台灣作家的創傷書寫，在現代詩研究方面如徐培晃的《跨世紀的自我追尋——台灣現代詩中的創傷、逸離與超越》已注意到心靈書寫、創傷書寫的趨勢，此文以生死動能為核心，以創傷—逸離—超越為思考脈絡，去探討台灣現代詩中生命與時空的互動。其餘則多為個別作家的創傷書寫情況探討，大都從歷史或政治的創傷、同志愛慾的創傷談起。

本文所探討的「創傷書寫」則從佛洛伊德的基本看法出發，強調創傷記憶的固置、侵擾與延宕性，以及表達的斷裂性，例如許多台籍慰安婦在接受社工晤談時，一談起過去的事情，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常表現出憤怒、驚恐的情緒。另外，將配合卡如絲的集體歷史創傷的角度來審視慰安婦創傷經驗的背景與事後的公共論述建構。由此，作為台灣歷史與女性群體之一的江文瑜，她在當代執筆書寫此一創傷事件便呈顯出必要性與心理療癒意義。至於江文瑜詩歌寫作慣用雙關語，也將探析其中的語言錯置現象，發現其是否試圖傳達創傷記憶之扭曲。而在事件發生後幾十年，官方起先的忽視、創傷主體遭賤斥而隱藏記憶，或是詩人面對歷史紀錄時的震驚與創傷認同感，進而以文學來形構創傷經驗，皆是一種心理創傷典型的延宕性。

此外，本文立論的基礎同時來自上述卡如絲所提出的創傷事件無法重新來過，而見證或再現也無法達成時，可透過語言來填補歷史內在創傷的意義斷裂。彭仁郁曾以田野調查者的角色與台籍慰安婦相處，她申明：

¹⁸ 楊小濱著，愚人譯，《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9年），頁53。

創傷主體需要重新被賦予言說主體的位置，而非被視為外顯身心症狀的叢結。創傷主體之所以受苦，是因為無法走出不斷以現在式反覆出現的夢魘。主體難以象徵化、意識化的心理真實，需要透過與他者（other）的可共享性，及象徵秩序中至高他者的認納，才可能以過去式在個人史上銘印下來，即成為被標記為過去的歷史真實，或如 Freud 所說，「失去它的殺傷力」…受害者經常是事件唯一的見證者，不論願意與否，都被賦予看守遭大歷史抹除的創傷憶痕的任務，亦總是被永恆復返的歷史幽靈附身。而避免自己、親人或後代，被這些糾纏不去的幽靈壓垮的唯一方法，是讓這些創傷憶痕獲得銘印，而銘印的發生必須以他者的共在、共享為前提。¹⁹

她強調心理創傷治療／分析療癒強調「創傷賦義轉化」，也就是必須讓創傷主體得以言說，共享經驗，以及被象徵秩序所認納（recognition），才能減弱創傷的殺傷力。而文學作為一種可傳播的情感溝通形式，即在提供心理真實的可共享性。因此分析文本裡敘說的女性創傷經驗，同時也能觀察到創作者是否已為創傷主體找到「可敘說」的方式，為女性共享與承擔的歷史創傷紀錄展開心靈療癒之路。不過，彭仁郁雖然肯定創傷的賦義化（significance），卻也警醒著創傷經驗公共化之後，若被重複講述以致僵化為固定版本，創傷主體反而會異化，遠離真實，所以應該朝向一個允許各種衝突、憤怒、陰影、羞恥、醜惡現身的開放言說空間。本文也將以此自覺檢視江文瑜對慰安婦形象的文學再現，將其視為江文瑜個人處置創傷歷史的方式，而非最終而固定的版本。

三、書寫療癒：江文瑜〈木瓜〉重現慰安婦的創傷經驗

江文瑜²⁰的第一本詩集《男人的乳頭》²¹是以直率、辛辣的語言，坦露女體，批判父權，具有強烈的女性主義色彩。這本詩集的評價極其兩極，獨特而鮮明

¹⁹ 同註 8，頁 463-464。

²⁰ 江文瑜，1961 年出生，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碩士，德拉瓦大學語言學博士，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涵蓋音韻學、語音學、社會語言學、文化評論。創作以詩為主軸，曾擔任「女鯨詩社」召集人。著有詩集《男人的乳頭》、《阿

的女性意識固然成為建構女性詩的基石，過於直露的語言則被認為斷傷詩的質地。其中對於女性身分之討論，則是將女性放於「受壓迫者」位置，因此以取代男權為要務，試圖「篡位」與「翻轉」。到了第二本詩集《阿媽的料理》，江文瑜內在的女性主義呼聲仍然存在，但是在書寫策略上則有變化，她關注於女性在歷史中的形象與定位，也著重女性在社會生活裡的樣貌。這樣的轉變，也許與江文瑜同時期致力提倡的「書寫女性」有關，她舉辦活動、編輯書籍，邀請民眾來寫作女性故事，相信如此一來可幫助下一代認識「母親原型」、社會中的母親，另一方面也可以深入了解女性的內心私密。從《阿媽的故事》、《消失中的台灣阿媽》到《阿母的故事》，就是江文瑜提倡「書寫女性」的具體成果。她的目的在於「建構女性的史觀」，把歷史從男性主導的「history」變成女性觀點的「herstory」。

其實歷史本來就是建構起來的，是人透過史觀或詮釋權把事實累積起來。但是一部完整的歷史除了有「人時地事」等事實，還要有情感的投射和內心的想法。後者在建構女性歷史時更能發揮。現在女人現身說法說出自己的故事，開始建立屬於女人的史觀。台灣的歷史透過女性歷史來呈現，可能會迥異於男性觀點。例如做「二二八」口述歷史，以前著重採訪外在的事實，如見證人當時看到受難者被如何凌虐等，現在則轉向訪問女性在整個過程所受的創傷，和內心的感受等，這就是史觀的轉移。²²

號召女性來寫歷史，除了試圖轉移史觀，保存下來的各個女性創傷故事，也成為這系列作品的另外焦點。江文瑜指出在女性歷史裡所感受到的女性創傷心理，許多是來自於「身為女性」這個事實，「阿媽如何在婚姻制度、家庭組織、人際關係、宗教信仰、經濟活動、社會風俗……中走過兩性極不平等的歲月」²³。

媽的料理》、《合掌：翁倩玉版畫與江文瑜詩歌共舞》、《佛陀在貓瞳裡種下玫瑰》和《女教授／教隨手記》。曾擔任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創會理事長，編有《阿媽的故事》、《消失中的台灣阿媽》、《阿母的故事》等女性生命史的三部曲。

²¹ 江文瑜，《男人的乳頭》（台北：元尊文化，1998年）。

²² 劉蘊芳採訪整理，〈建構屬於女性的歷史——江文瑜專訪〉，《光華》21卷5期（1996年5月），頁56。

²³ 江文瑜，〈編序〉，《阿媽的故事》（台北：玉山社，1995年），頁7。

因此，當她自己以詩來重構女性歷史時，她一方面指出女性在歷史與社會結構裡的宿命「創傷」，一方面又試著從這創傷性再探女性更幽微的心情，由此找到了可以重塑女性身分的空間：

阿媽在台灣特殊的殖民背景下如何遭受性別與殖民的雙重壓迫……我們藉此了解女性被壓迫的多重原因，更一步了解在歷史變遷的過程中，台灣阿媽超越精神與體力極限的艱苦不再是後代女性必須重覆的宿命。²⁴

在上述的創作觀點與建構女性史的背景之下，江文瑜察覺台灣阿嬤的創傷經驗裡最邊緣與弱勢的，即是慰安婦阿嬤。然而《阿媽的故事》所收錄 24 篇故事裡竟沒有任何一個慰安婦阿嬤的故事，難道她們的苦難與創傷，尚未找到社會（尤其是後代）認納的方式？江文瑜明顯意識到慰安婦阿嬤多重弱勢的處境，選擇以身體創傷書寫的文學再現，來回應對歷史暴力的不滿，同時重新「記憶」傷口，透過詩歌說出創傷「當時」來進行療癒。

《阿媽的料理》一書，分為三部，第一部「阿媽的料理系列」（24 首詩）、第二部「飲食雌雄系列」（30 首詩）和第三部「台灣餐廳秀系列」（27 首詩），每首詩皆以料理或食物名稱為題。如同作序的女性詩評家李元貞所言：

江文瑜有計畫有主題的鍛鍊詩語，企圖將料理（食物）、意識（主體書寫）、詩藝（語言變化）繪聲繪影，將詩的書寫形成色香味及觸感的女人或人的故事。集中於阿媽（女人認同、女人歷史）與日常生活的種種面向，哀痛又幽默地展現女人的身影。²⁵

這本詩集的第一部「阿媽的料理系列」（24 首詩）更是主要處理日治時期的女性生命、傳統女性與童養媳的命運、二二八事件的女性等具有創傷性的女性故事，本文主要論述的對象〈木瓜〉即收錄於此。

「阿媽的料理系列」有兩個重要的書寫特質，一是身體性，二是食物意象。

²⁴ 江文瑜，〈台灣女性史的花蕊綻放——《阿媽的故事》導讀〉，《台北畫刊》第 338 期（1996 年 3 月），頁 23。

²⁵ 李元貞，〈從阿媽的料理（詩藝）評江文瑜第二本詩集〉，收於江文瑜：《阿媽的料理》（台北：女書文化，2001 年），頁 5。

Di Prete 曾觀察到文學及視覺文本中存在某種結構性的創傷敘事，而這些創傷敘述又經常和「身體性」相關聯，像是經常以身體作為符號再現或是發出個體內在的聲音。

故創傷敘事乃涉及後殖民時代邊緣主體的發聲，具有某種自發、主動與自主性特質。個體針對自己或它者生命所遭遇的創傷處境，進行再現的動作，也是一種主體發聲、療癒與認同追尋的過程。²⁶

在這描述集體性女性創傷書寫裡，如前所述，我們既可看出江文瑜對殖民國或父權的控訴，又可細察出她對女性情慾偷渡的想像、食物或庶民生活的活潑生命力之刻劃、食物之內的「雌性修辭」²⁷等，可見她將女性從固定的「被壓迫者」身份裡，尋找出更活躍、更有自主性的空間（尤其在現代年輕女性身上），展開女性身分再協商。甚者，如前所述，歷史可藉此重新詮釋，讓史觀移轉。

以下舉幾首詩為例說明。例如〈黑芝麻〉²⁸詩裡，她用文字排列成民間常見的「面痣圖」，以「宜出 產厄」、「貴夫 宜子 宜養」等算命用語來呈現傳統中女性的被規範與命運。這些命定的人生定格，如同「命運之神抓起一把黑芝麻／隨風飄落大地／播種一張女人的臉龐」。女人長久以來就是活在這些言語之中，被評價、被安排。但是，到了現代，黑芝麻雖已盤根錯節，根深蒂固，阿媽的孫女卻能以現代雷射科技澈底清除。已剝除的黑芝麻（女性命運），現代阿媽「一把一把」熱炒，不是為了還原「面痣」，而是對抗白髮。女性命運隨著時代演進，已不必然要求原樣傳承，「面痣圖」無關命運，只關面子。另一詩例為〈螞蟻上樹〉²⁹，詩中右側有一放大鏡的圖象，鏡中照出大大的「姦」字，左側則是密密麻麻細小的「女」字，參差排列，有螞蟻行伍之貌。跨頁有一詩作，分為兩節：

²⁶ 簡瑛瑛、賴孟君，〈生命書寫與藝術再現：從阿烏到依布的台灣原住民女性創作〉，《政大民族學報》第 28 期（2009 年 6 月），頁 103。

²⁷ 江文瑜，《阿媽的料理》（台北：女書文化，2001 年），頁 75。〈南瓜頭〉詩中敘述：「血的吶喊穿過身體甬道／卻逐漸逐漸止住了語言／產婆阿媽特製的南瓜頭擋住了／這一段雌性修辭，顫抖／的演說。」

²⁸ 同註 27，頁 34。

²⁹ 同註 27，頁 36。

隔壁的他有空就過來寒暄
拋出一種眼神
她，一個寡婦人家
站在窗戶邊，望過鄰居對門

偶而閃過她遠赴南洋征戰不歸的
臨去前的面容
桌上一盤冬粉
早已爬滿不知來自何處的螞蟻

從詩行的敘事，可聯想為所謂「螞蟻上樹」即是日治時期守寡（或守活寡）阿媽內在情慾的騷動。那螞蟻行列即是蠢蠢欲動的心理線索，被詩人以放大鏡照出潛在的「姦」。詩雖然以趣味的圖象詩形式表現，女人身體被箝制在禮制規範內的處境也不言可喻，寡婦的情慾一萌芽，便有輿論的放大鏡在檢視著，因此只能想像與壓抑。

與這些食物詩並列的〈木瓜〉，同樣關注於女體與食物隱喻，並且將女體創傷指向一個被殖民化身體的標記，也是台灣歷史的印記。全詩如下：

她拒絕
像其他悠閒的阿媽，褪盡衣衫
在每一次日光浴裡
向浮雲友善地打招呼

她也不允許黑夜以閱兵的姿勢
輕輕俯觸她胸前的兩粒木瓜

五十幾年前，充滿青春的乳房
被當成泛著白光的省電燈泡
持久、耐用
日本軍人一個接一個接上插頭
以為彈性的玻璃永不破碎

屋裡未曾點燈
幽暗光線看不清對方的臉
他訕笑、他狂怒、他愉悅、他解脫
她胸口的白光照不亮他們的臉龐
在這個沒有地名的小房間
在菲律賓島上
她必須以體內僅存的光——
慰安 未安 畏暗

他們劇烈衝撞 前仆後繼
攻向一塊陌生／默聲的土地
她在一艘船上搖晃
或許，自己就是一艘船
士兵排列成海浪
推送她遠離家鄉
役場強迫登陸／登錄她的名字
每一批左營出發的船載運
未知／慰汗方向的航程

船經過越南湄公河口
轟炸機炸彈散落
甲板瞬間碎裂
她眼見另一半的船身下沉
巨大的重量壓住她的下半身
她逐漸呼吸困難
抓不住任何浮木
水如魚雷般灌進她的身體
泡沫從口中取代她的語言
另一艘輪船再度起航

穿越巴士海峽

她的身份與姓名被重新變更／遍耕

一座叢林

軍艦整批卸下士兵

藏匿在她的地／蒂盤

每一個夜裡，士兵繼續匍匐

押駐／壓住叢林

除了擦槍走火

宇宙間惟有靈魂出竅／鞘的聲響

五十幾年後

荒蕪的大地散落一地的木／墓瓜

她受傷／瘦瘍的脊椎無法彎腰撿拾

只幻見滿地滾動的燈泡／砲

似燈芯已然焦黑的廢棄物

四周蟲鳴

風琴與口琴的軍歌

「還在菲律賓島上嗎？」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

慰安婦阿媽從被日本政府抓去以後，身體就流離化了，不再擁有一個體意義，淪為工具或異己。江文瑜不僅寫出阿媽的身體，也寫出背後的殖民體與男性團體所建制起來的創傷工具（日本軍人、士兵）。台灣社會透過紀錄片、攝影、訪談或故事紀錄等各種形式，都表達了慰安婦的經歷如何悲慘，慰安經驗讓她們失去做女人的價值，甚至是做人的價值，因此被歧視，或自鄙自賤，失去幸福的可能。除了身體的創傷，社會眼光、一個傳統女人價值的框架更是另一種創傷源頭。然而，創傷卻無法忘懷，「當時的糟蹋讓我的身體變不好，他們會忘記，我是永遠忘不了的。」³⁰創傷記憶便像佛洛伊德所言，一個被壓抑與不斷重返

³⁰ 黃子明、王墨林，〈阿嬤集合：台籍慰安婦的身影與傷痕〉，《印刻文學生活誌》4卷12期

的創傷記憶會產生持續性，甚至透過複述，影響了下一代女性，不在歷史現場的她們也必須去理解與尋求減輕心理負擔的方式。江文瑜以詩歌來代言，即是一種尋求減輕歷史陰魂的侵擾。

詩中刻意運用雙聲／諧音（語言邏輯內的是事件，之外是女體或慰安婦處境），以雙線（女體、被殖民土地）敘述軸來交織當時慰安婦的個體即是歷史整體。江文瑜使用多種譬喻，如燈泡、木瓜、船、叢林來比擬慰安婦身體，暗諷主體已降低價值性成為物體。慰安婦阿媽的心理創傷也被呈現，她無法面對自己的裸體，無法面對黑夜來臨所伴隨的幽暗創傷記憶（日本兵的訕笑、狂怒、在她身上洩慾），她未安、畏暗，身體欺凌所產生的創傷衝擊過劇，心理防衛機制導向靈魂出竅、解離。經過五十幾年後，阿媽所壓抑的心理創傷仍不時侵擾，如她幻見、精神錯亂。慰安婦阿媽的身體創傷，被譬喻成耗盡的乳房（白光省電燈泡）、一塊默聲的土地、荒蕪的大地，木瓜／墓瓜、焦黑燈芯。而慰安婦的主體認同（社會身分與姓名），則被強迫登錄為慰安婦，被重新變更，如身體（叢林）被遍耕，自此喪失自我。雙關語的運用，具備暗喻的聯想性質，也充分呈現「幻見」的心靈活動。語言的「失誤」（補充）暗示創傷主體對創傷經驗的無法正確言說，在理解與表達中，「詞」（詞語表徵）與「物」（情感表徵）之間會產生斷裂與錯結。

「木瓜」作為本詩詩題與核心意象，充分發揮上述之女體指涉。除此，更可再驗證「木瓜」在台灣文學表達系統的意義輻射，如何從南國水果，層層疊映台灣、土地、生命力、女性、乳房等涵義，成為一個強烈隱喻台灣作為殖民地處境的文學符號。例如在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小說場景多處出現木瓜樹，許多研究者曾闡釋木瓜在小說裡的作用，其中王惠珍認為此文所描寫的木瓜即是台灣人的精神風貌³¹。而陳千武的〈木瓜花〉詩作有一節「而石階上的木瓜花 悠然／沉默 像健美多產的孕婦」³²，將木瓜隱喻為原始生命力與台灣意識的象徵。甚而，在詩文之外，以木瓜為主題的知名台灣畫家林惺嶽，

（2008年8月），頁204。

³¹ 王惠珍，《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頁99。

³² 此詩收於陳明台主編，《陳千武詩全集》（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4年），頁173-174。

在他的觀點裡，木瓜是繁殖力和生命力最強的台灣水果，既具有女性乳房與母性的暗示，也在日常生活中與台灣人民緊密相關，因此特別值得藝術家加以表現³³。梳理出這一條「木瓜」在台灣文學與文化裡的象徵圖象，我們更可以印證江文瑜〈木瓜〉一詩選擇「木瓜」作為台灣—被殖民的土地—女體的象徵，事實上是一種集體思維的映現，表達出女性與國族的自視。此外，木瓜強韌生命力特徵所蘊含的涵義，讓詩末處的兩句詩表現出更具能動性的意義指涉，「五十幾年後／荒蕪的大地散落一地的木瓜／墓瓜」，既隱喻創傷女體，又翻轉受壓迫者的單一位置，開創出木瓜落地、種籽繁衍，豐饒台灣土地的聯想空間。藉由詩歌象徵的重構，江文瑜給予慰安婦主體形象更具協商之可能。

而江文瑜以旁觀視角（她）帶著創傷主體重返歷史現場，更進一步把創傷主體以詩歌象徵化、符號化、意義化，將慰安婦的創傷經驗整理成社會認納的層次，本文認為這首詩即在為創傷主體找出一種言說／分析／療癒的方式。支持的他者（江文瑜）之理解與分享，並將當事人無法言說的恐怖真實表徵化，即是一種重新連結創傷主體與世界關係的嘗試。詩歌特別的象徵形式，在此表達言說方式中發揮重要作用：

象徵之所以具有轉化和療癒的潛能，正是因為它們超越原來可以被輕易用語言表達、分類，以及理解的概念。……由於象徵可以把案主和他們本身的未知層面連結起來，因此象徵的呈現也具有轉化和療癒的潛能。³⁴

透過文學象徵，創傷主體無法言說的記憶可以被含括被轉化被表達，而詩人透過第三人稱（她）的後設言說，帶著賦義的距離，重新在詩中回到歷史現場。〈木瓜〉呈顯的書寫意義不在於陷溺創傷主體的受害位置，也不是複製創傷衝擊，而是重新整理，把創傷主體當時無法指認的創傷源頭，在詩歌意象排列中，一一認領。如此，詩人可透過語言來填補集體歷史內在創傷的意義斷裂，指認意義，而創傷主體得以在文學形式的共享中被理解、被認納。

³³ 彭宇薰，《逆境激流——林惺嶽傳》（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2年）。

³⁴ 劉冠姘、黃宗堅，〈創傷與復原：隱喻故事在心理治療中的運用〉，《諮商與輔導》第250期（2006年10月），頁22-23。

四、結論：創傷書寫的意義

見證者第一人稱的敘事，與聆聽者第一人稱的想像認同，共同完成了見證事件。如此獲得與我相似、卻又非我的他者目光映照出的鏡像的確認，原本凝結、停滯的創傷時刻，重開始流動。被封存在凍結時間裡的受創、受辱的孤寂少女，必須重返與他者共在的世間，才能進入哀悼歷程。³⁵

江文瑜從事「阿嬤的故事」收集工作，對於慰安婦阿嬤的故事難以被社會所言說之現象，她直以詩歌寫作來代言。其書寫意義不僅如彭仁郁所強調的創傷賦義轉化，讓慰安婦故事進入社會認納的層次，減輕恐怖真實的侵擾，重構創傷主體與世界的連結；同時，文學將成為一種記憶歷史創傷的公共論述，對於主流的歷史敘述而言，多元而異質的慰安婦創傷故事加入，更可產生質疑大歷史因民族、權力或性別問題而「消費」慰安婦的存在，或為了便利性或曖昧性而剝除慰安婦的歷史位置。

對於詩人自身的書寫意義，則是指出集體歷史裡的創傷陰影，讓精神分析學說所言的「世代創傷繼承」得以被照明，並尋求安置，最後成為象徵形式的可分享性集體記憶。換言之，江文瑜以詩再現「慰安婦」創傷，一方面讓其故事被社會認納，另一方面也在安撫自身不被未安息的創傷幽靈侵擾。此外江文瑜的再現是從被殖民者女性的立場書寫她們的個人生命史，也從女性角度重新看宏大的歷史事件。同時具備庶民史、女性、被殖民者的觀點。其書寫成效在於「建構女性的史觀」，承前所述，她意圖把歷史從男性主導的「history」變成女性觀點的「herstory」。為慰安婦阿媽說出身心創傷，即能將著重公領域的事件性歷史，轉移成強調情感與心理的私領域創傷史；將權力主宰者的輝煌戰績羅列史，轉移為受欺凌者的幽暗傷口指陳史。透過〈木瓜〉一詩的鋪展，江文瑜表現出記錄女性與轉移史觀的書寫實踐。

³⁵ 同註 8，頁 489。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桂林：遠方，1944年）。
- 王惠珍，《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 朱德蘭，《臺灣慰安婦》（台北：五南，2009年）。
- 江文瑜，《阿媽的故事》（台北：玉山社，1995年）。
- 江文瑜，《男人的乳頭》（台北：元尊文化，1998年）。
- 江文瑜，《阿媽的料理》（台北：女書文化，2001年）。
- 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2014年）。
- 李碧華，《煙花三月》（台北：臉譜出版，2011年）。
- 佛洛依德著，葉頌壽譯，《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導論》（台北：志文出版社，1997年）。
- 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臺灣慰安婦報告》（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
- 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阿嬤的臉：台灣慰安婦倖存者影像紀錄》（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2005年）。
- 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阿嬤的故事袋：老年、創傷、身心療癒》（台北：張老師文化，2005年）。
- 婦女救援基金會採訪記錄，夏珍編寫，《鐵盒裡的青春：台籍慰安婦的故事》（台北：天下文化，2005年）。
- 婦女救援基金會，賴采兒、吳慧玲、游茹菜，《沉默的傷痕：日軍慰安婦歷史影像書》（台北：商周出版，2005年）。
- 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黃子明設計，《愛無境筆記書》（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2007年）。
- 陳明台主編，《陳千武詩全集》（台中：台中市文化局，2004年）。

陳香君著，周靈芝、項幼榕譯，《紀念之外——二二八事件·創傷與性別差異的美學》（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4年）。

彭宇薰，《逆境激流——林惺嶽傳》（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2年）。

楊小濱著，愚人譯，《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9年）。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江文瑜，〈台灣女性史的花蕊綻放——《阿媽的故事》導讀〉，《台北畫刊》第338期（1996年3月），頁22-24。

彭仁郁，〈進入公共空間的私密創傷：台灣「慰安婦」的見證敘事作為療癒場景〉，《文化研究》第14期（2012年6月），頁135-192。

黃子明、王墨林，〈阿嬤集合：台籍慰安婦的身影與傷痕〉，《印刻文學生活誌》4卷12期（2008年8月），頁202-211。

黃心雅，〈創傷與文學書寫〉，《英美文學評論》第20期（2012年6月），前言頁5-9。

劉蘊芳採訪整理，〈建構屬於女性的歷史——江文瑜專訪〉，《光華》21卷5期（1996年5月），頁56。

劉冠姁、黃宗堅，〈創傷與復原：隱喻故事在心理治療中的運用〉，《諮商與輔導》第250期（2006年10月），頁22-27。

簡瑛瑛、賴孟君，〈生命書寫與藝術再現：從阿烏到依布的台灣原住民女性創作〉，《政大民族學報》第28期（2009年6月），頁101-130。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1996).

三、電子媒體

朝鮮中央通訊社網站的統計資料，(來源：<http://www.awf.or.jp/e1/facts-07.html>，
2017年10月10日)

四、紀錄片

《阿嬤的秘密》(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1998年)。

《蘆葦之歌》(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2015年)。